

## 「人心思魏」與魏齊禪代

胡 勝 源\*

### 提 要

高洋欲代東魏建立北齊，卻遭遇龐大的反對浪潮，學界大多以眾人皆輕視高洋做為解釋的切入點。對此，本文則有另一層面的思考。本文認為，高歡臨死前的遺願是希望高澄、高洋兄弟能與勳貴一起支撐東魏政權，但高氏兄弟相繼執掌大權後，皆為彌補自身威望不足，不惜違背父訓，競相以建立新政權的方式鞏固權力基礎。

然而，早在高澄禪代籌劃初期，核心幕僚陳元康就直指此事不可行，理由是「時事未可」。而高洋大張旗鼓欲取魏代之的動作，更遇到一波又一波的勸阻聲浪，不僅其母婁昭君以「天位不可妄據」為由，堅決反對，諸勳貴與鄴都群臣也都極力苦勸，致使高洋不得不屈從於公意，暫時中止篡位。最後高洋雖仍遂行移鼎之事，卻是採取突襲手段，在短短七天的時間裡，營造出大勢底定的局面，讓眾人無法再有異議。眾人之所以極力阻擋高洋篡位，並非質疑高洋沒有能力扮演好皇帝的角色，而是根本就不相信人心所向的東魏政權已然行至退場時刻。從而，高洋雖順利登上帝位，但人心對魏朝依然眷戀，也深深影響了北齊初期政治的發展傾向。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 高歡 高澄 高洋 人心思魏

---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 一、前言
- 二、高歡遺言的特殊性
- 三、高澄圖謀代魏的根本原因
- 四、「人心思魏」與高洋篡位時所遭遇的阻礙
- 五、「人心思魏」與高洋的恐怖屠殺
- 六、結論

## 一、前言

東魏孝靜帝（524-551，534-550 在位）武定八年（550）三月，初步穩定執政腳步的高洋（529-559，550-559 在位），在高德政（？-559）、徐之才（492-572）等人的勸進下，決意取東魏而代之，卻遭遇猛烈的反對聲浪。不僅與高歡（496-547）一同創業的諸勳貴極力反對，連母親婁昭君（501-562）也堅決不允，使得高洋不得不暫時中止篡位計畫。<sup>1</sup>對此，谷川道雄認為，因高洋沒有成為霸者的能力，而被婁昭君與諸勳貴所輕視，篡位之事才會一波三折。<sup>2</sup>呂春盛大體承續谷川的說法，但更進一步指出，反對高洋篡位者多屬於鮮卑或鮮卑化集團，支持篡位者則皆是漢族文官，因此高洋篡位事件也含有胡漢兩集團衝突的意味。<sup>3</sup>王怡辰則強調，晉陽軍方與以鄴都為權力中心的高洋集團之間，一直有很強的疏離感，才會反對高洋篡位。<sup>4</sup>王氏所論，廣義言之，亦屬胡漢集團衝突的一環，可與呂氏之說歸於同一範疇。

先學所論誠屬精闢，但我們應注意到，高洋早在接棒的那一刻起，

---

1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 點校本），卷 163，頁 5042。

2 〔日〕谷川道雄著，李濟滄譯，《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 216。

3 呂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7），頁 204-206。

4 王怡辰，《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頁 251。

就展現了不輸其兄高澄的氣度與決斷力，讓人為之驚訝不已。<sup>5</sup>此外，就算高洋的能力不足以成為如高歡、高澄（521-549）一般的霸者，但對婁昭君與諸勳貴來說，無能的高洋登基為帝，正有利於他們在幕後操控政治。其實，不只高洋，早在高澄意圖篡位時，連善於「希顏候意」的核心幕僚陳元康（507-549），都以「時事未可」為由，極力反對。<sup>6</sup>高澄無論在聲望或實力上都遠勝高洋，卻也遇到相似的問題，可見個人因素似非篡位遭遇阻礙的主因。那麼，原因是否即為胡漢集團衝突呢？似乎也未必盡然，因為反對高洋篡位者並不只鮮卑或鮮卑化集團分子，漢族文官亦有多人不以為然。<sup>7</sup>因此，將高洋篡位事件以胡漢集團衝突來加以定義，似有缺漏，應有其他因素使然。

對此，如翻查《魏書·孝靜紀》中孝靜帝退位時的記載，似可一窺端倪：

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後宮。」乃與夫人妃嬪已下訣，莫不歔歔掩涕。嬪趙國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已下皆哭。……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僚衣冠拜辭，

---

5 「武定七年（549）八月，世宗遇害，事出倉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贊斬羣賊而漆其頭，徐宣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焉。乃赴晉陽，親總庶政，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唐〕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點校本），卷 4，〈文宣紀〉，頁 44。《北史》則載：「乃赴晉陽總庶政。帝內雖明察，外若不了，老臣宿將皆輕帝。於是帝推誠接下，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羣情始服。」〔唐〕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點校本），卷 7，〈齊文宣紀〉，頁 244。又，「（高洋）及至并州，慰諭將士，措辭款實。眾皆欣然，曰：『誰謂左僕射翻不減令公。』令公即指文襄也。」見前書，〈齊文宣紀〉，頁 258。

6 《北齊書》，卷 24，〈陳元康傳〉，頁 342-344。

7 「使高德正〔政〕之鄴，諷喻公卿，莫有應者。」《北史》，卷 7，〈齊文宣紀〉，頁 258。「齊受禪，靜帝遜居別宮，與諸臣別，讓之流涕歔歔。」《北史》，卷 38，〈裴讓之傳〉，頁 1385。「司馬子如逆帝於遼陽，固言未可。杜弼亦抱馬諫。」《北史》，卷 7，〈齊文宣紀〉，頁 258。

帝曰：「今日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眾皆悲愴，高隆之泣灑。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宅。<sup>8</sup>

孝靜帝退位時的場面可以說是備極哀榮，從「今日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一語，可略知一二。而群臣態度「皆悲愴」，也可看出是如此依依不捨，可見人心對魏室還是相當眷戀。本文希望能以此為中心，重新申論魏齊禪代時高洋所遭遇的諸多難題及其影響。

## 二、高歡遺言的特殊性

東魏孝靜帝武定四年（546）八月，高歡率領大軍，包圍汾水流域的西魏重鎮玉壁城，在韋孝寬（509-580）堅強的防禦之下，高歡屯兵城下五十天，用盡一切方法都攻不下玉壁城，戰死或病死的將士就已達七萬人。高歡為之「智力俱困」，而一病不起，<sup>9</sup>那時，他已自知不久人世，於是召集諸將交託後事。《北齊書·段韶傳》載：

（高歡）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豐等曰：「吾每與段孝先論兵，殊有英略，若使比來用其謀，亦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勢危篤，恐或不虞，欲委孝先以鄴下之事，何如？」金等曰：「知臣莫若君，實無出孝先。」仍謂韶曰：「吾昔與卿父冒涉險難，同獎王室，建此大功。今病疾如此，殆將不濟，宜善相翼佐，克茲負荷。」即令韶從顯祖鎮鄴，召世宗赴軍。<sup>10</sup>

可知，高歡死前回顧此生所達到的最大功業，就是掃除了尔朱氏的暴政，而有中興魏室之功。侯景（？-552）也有同樣的看法。《北齊書·文襄

---

8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點校本），卷 12，〈孝靜紀〉，頁 314。

9 《北史》，卷 6，〈齊神武紀〉，頁 230；卷 64，〈韋孝寬傳〉，頁 2261。

10 《北齊書》，卷 16，〈段韶傳〉，頁 209。斛律金等人之語，從高歡「同獎王室」一語可知，並非視其為君，而是如谷川道雄所說，視高歡為「同輩中的第一人」。請參谷川道雄著，李濟滄譯，《隋唐帝國形成史論》，頁 215。

## 紀》載侯景報高澄書：

且尊王平昔見與比肩，勦力同心，共獎帝室，雖復權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雁行而已。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授，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之盜，祿去公室，抑謂不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拜恩私第，何足關言。<sup>11</sup>

高歡的「同獎王室」與侯景的「共獎帝室」是完全一致的，可見侯景、斛律金（488-567）等勳貴也與高歡相同，皆以同獎王室為傲。其實，他們這群人所以被稱為勳貴，原本就是因與高歡一同起兵，推翻了尔朱氏暴政的緣故。<sup>12</sup>此外，高歡所說的「吾昔與卿父冒涉險艱，同獎王室」，與侯景所說的「尊王平昔見與比肩，勦力同心，共獎帝室」，兩者所包

11 《北齊書》，卷3，〈文襄紀〉，頁34。

12 關於「勳貴」的定義，谷川道雄認為，乃是高歡在懷朔鎮、信都舉兵時，以及平定尔朱氏後的各個階段中，為他掌握霸權而盡力的一群人。谷川道雄著，李濟滄譯，《隋唐帝國形成史論》，頁218。谷川的定義深刻描繪出勳貴的特質，可是卻過於強調這些人被稱為「勳貴」是因他們幫助高歡建立霸業的因素，如果以時人的角度來看，仍有疑義。如「（普泰元年）〔531〕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15）、「（太昌元年〔532〕夏四月）……齊獻武王上言，建義之家枉為尔朱氏所籍沒者，悉皆蠲免。」（《魏書》，卷11，〈出帝紀〉，頁281-282）這是高歡立孝武帝後不久的事，高歡所說的「建義之家」，比照前引史料，就是指跟從高歡一起舉兵信都之人的家屬。從高歡立元朗時的年號為中興，便能瞭解高歡起兵所打出的口號就是中興魏室，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必須打倒尔朱氏的暴政。正因高歡等人起兵打倒尔朱氏，從而建義的舉動有大功於魏室，所以參與建義的人便有「勳」，通常史書是以「建義勳」或「建義功」來加以稱呼。如「自昂初以豪俠立名……，隨其建義者，李希光、劉叔宗、劉孟和。並仕宦顯達。孟和名協，……以建義勳，賜爵長廣縣伯。」（《北齊書》，卷21，〈高昂傳〉，頁299）隨之建義者即是跟隨高昂起兵信都的人，劉孟和之所以被賜爵為常廣縣伯，便是因為他有跟隨高昂一起建義的功勳。崔悛也是一個例子，「以建義功，封武城縣公，邑一千四百戶，進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領黃門郎。……及（魏）收聘梁，過徐州，悛備刺史鹵簿而送之，使人相聞魏曰：『勿怪儀衛多，稽古之力也。』收報曰：『白崔徐州，建義之勳，何稽古之有！』」（《北齊書》，卷21，〈崔悛傳〉，頁333-334）以建義勳或建義功而獲得高官厚爵，才被稱為「勳貴」。因此，我們如果把在信都舉義以及在舉義過程中參與推翻尔朱氏，而有「同獎王室，建此大功」的一群人視為「勳貴」，應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含的意涵也是一致的，那就是高歡雖是同輩中的第一人，但他與侯景、斛律金等人的身分卻都是平等的，皆為孝靜帝的臣子。

高歡當著諸勳貴的面，把後事寄託給段榮之子段韶（?-571）時，便意味著高歡期盼他們上一代的夥伴關係，也能延續到高澄、段韶這一輩，希望他們能同心協力共同撐起東魏政權。高歡隨即令高澄到晉陽坐鎮，而高洋則在段韶的陪伴下，到鄴都輔政。<sup>13</sup>也就是說，高澄到晉陽接替高歡的位置，而高洋則到鄴都，替補高澄之位。

此外，高歡還有不能在諸將面前坦露的私密之事，必須私下交代即將掌握軍權的高澄，那就是如何處理侯景即將發動的叛亂。《北史·齊神武紀》載：

神武謂世子曰：「我雖疾，爾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豈非憂侯景叛邪？」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願我能養，豈為汝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並性道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賀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相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略。」<sup>14</sup>

高歡早在沙苑戰後便對侯景懷有戒心，<sup>15</sup>但又不得不借重侯景之力，幫他鎮守河南前線。高歡也很清楚，以侯景的狡猾，勢必不能為高澄所用。而且，即使有十年的輔政經驗，高澄也無法真正讓眾人相信有承擔大任的能力。侯景就對高澄相當輕視，曾經對司馬子如（488-551）說過：「王

13 《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30。

14 《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30-231。

15 「沙苑敗後，侯景屢言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悅，以告于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懶失景，亦有何利。』乃止。」《北史》，卷14，〈武明皇后婁氏傳〉，頁516。



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sup>16</sup>司馬子如雖然馬上掩住侯景之口，可是從侯景會跟舊識說這些真心話來看，<sup>17</sup>司馬子如應也有同感。再加上高澄在鄴都輔政時整飭貪污，得罪不少勳貴，<sup>18</sup>高歡死後，高澄如果無法妥善處理即將到來的侯景叛變，那些久已不滿的勳貴可能也會響應侯景，東魏勢必土崩瓦解。

高歡雖也不滿意高澄，<sup>19</sup>此時卻別無選擇，只能將穩定大局的希望寄託在他身上。高澄長期在鄴都輔政，甚少參與軍務。高歡臨終前，必須向高澄全盤交代對諸將特質的觀察，到最後才點名慕容紹宗（501-549），認為只有他才能與侯景匹敵。再者，高歡擔心沒有指揮軍隊經驗的高澄無法確實貫徹他的策略，特別囑咐高澄，軍事方面的大事要跟段韶商議。<sup>20</sup>最終，高歡後悔沒有聽從陳元康之言，在邙山之戰趁機進攻西魏，把後患留給子孫，讓他「以此為恨，死不瞑目」。<sup>21</sup>

我們從高歡對於身後的政治布局來看，便可知道高歡期盼他的兒子高澄、高洋能與勳貴緊密地合作，一起支撐東魏政權。從高歡交託後事時，斛律金等人的態度，也能瞭解這是諸勳貴的共識。此外，高歡不僅把權力交給高澄，也將消滅西魏的重責大任一併賦予高澄。高歡用「以此為恨，死不瞑目」來形容錯失良機的心情，所以打敗西魏為高歡一雪前恥，就成為高歡子孫必須肩負的使命。

如果進一步把高歡遺言拿來與曹操（155-220）、宇文泰（507-556）的遺言相比，更可以看出高歡遺言的特殊性。曹操的遺言，據《三國志·

16 《北史》，卷 6，〈齊神武紀〉，頁 230。

17 「（高歡）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為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北史》，卷 6，〈齊神武紀〉，頁 210。侯景很有可能透過高歡的關係，早在懷朔鎮時期就與司馬子如結識。

18 《資治通鑑》，卷 158，頁 4920-4924。

19 「神武之征劉蠡升，文襄蒸於大車。神武還，一婢告之，二婢為證。神武杖文襄一百而幽之，武明后亦見隔絕。時彭城介朱太妃有寵，生王子湊，神武將有廢立意。」《北史》，卷 14，〈齊馮翊太妃鄭氏傳〉，頁 519。

20 《北齊書》，卷 16，〈段韶傳〉，頁 209。

21 《北齊書》，卷 24，〈陳元康傳〉，頁 343。

魏武紀》注載：

《魏略》曰：孫權上書稱臣，稱說天命。王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尚書桓階奏曰：「漢自安帝已來，政去公室，國統數絕，至於今者，唯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期運久已盡，曆數久已終，非適今日也。是以桓、靈之間，諸明圖緯者，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殿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漢，羣生注望，遐邇怨歎，是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愚以為虞、夏不以謙辭，殷、周不吝誅放，畏天知命，無所與讓也。」《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謂王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為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為政。』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sup>22</sup>

曹操不久就過世，視上述史料乃其遺言，並不為過。曹操雖然拒絕孫權（182-252）與群臣的勸進，卻留下意味深長的一句話，暗示自己只能當為子孫取代前朝打下基礎的周文王（？-1050 B.C.），周武王（？-1043 B.C.）的工作要留待他的兒子去做。翻查史籍，也能發現其他證據，證明曹操希望曹丕取漢室而代之。如當群臣勸曹丕（187-226）受漢禪時，向曹丕說，如果他不趕快正位，則「武王必不悅于高陵之玄宮矣」。<sup>23</sup>若非對曹操的真實心意有深刻的認知，群臣不會說出這樣的話。司馬光（1019-1086）認為曹操早已有無君之心，所以不敢代漢自立，是因顧慮到名義，<sup>24</sup>誠哉斯言。曹操雖然百般遮掩，甚至寫了〈讓縣自明本志令〉，再三解釋自己並無代漢之心，<sup>25</sup>可是臨終遺言勢必無法再加掩飾。田餘

22 〔魏〕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點校本），卷1，〈魏武紀〉注引《魏略》、《魏氏春秋》，頁52-53。

23 《三國志》，卷2，〈魏文紀〉注引《獻帝傳》，頁74。

24 《資治通鑑》，卷68，頁2173-2174。

25 《三國志》，卷1，〈魏武紀〉注引《魏武故事》，頁32-34。



慶就認為，曹操在臨終前，對於身後事的安排無法再含糊其詞，於是便搬出天命，確定曹丕的皇位。<sup>26</sup>

宇文泰的情形與曹操類似，但他欲篡位的跡象比曹操來得更加明顯。《北史·薛端傳》載：

魏帝廢，近臣有勸文帝（宇文泰）踐極，文帝召端告之。端以為三方未一，遽正名號，示天下以不廣。請待龕翦僭偽，然後俯順樂推。文帝撫端背曰：「成我者卿也。卿心既與我同，身豈與我異。」遂脫所著冠帶袍袴並以賜之。<sup>27</sup>

宇文泰想取魏而代之，已是公開的祕密，只是顧慮體面，才未落實。即便如此，宇文泰仍希望兒子能替他完成這個願望，從他臨終前遺言即能略知端倪。《周書·宇文護傳》載：

太祖（宇文泰）西巡至牽屯山，遇疾，馳驛召護。護至涇州見太祖，而太祖疾已綿篤。謂護曰：「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濟。諸子幼小，寇賊未寧，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而太祖崩。護祕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沖弱，彊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於是眾心乃定。先是，太祖常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旨，至是，人以護字當之。尋拜柱國。太祖山陵畢，護以天命有歸，遣人諷魏帝，遂行禪代之事。<sup>28</sup>

從宇文泰常說「我得胡力」，到他向宇文護（513-572）託付遺命等事，可以想見宇文泰對於宇文護的器重。從而，宇文護在處理完宇文泰喪事後，馬上就以天命有所歸，要魏帝退位，可見這就是宇文泰的遺志，宇文護不過是完成他生前規劃的最後一步而已。

---

26 田餘慶，〈關於曹操的幾個問題〉，收入氏著，《秦漢魏晉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142。

27 《北史》，卷36，〈薛端傳〉，頁1328。

28 〔唐〕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點校本），卷11，〈宇文護傳〉，頁166。

曹操與宇文泰雖因各有考量而無法親行禪代之事，但他們在臨終之前再也無顧忌時，都以暗示或明示的方式，表露讓子孫篡位的真實想法。可是高歡的情況卻與他們完全不同，他不僅對篡位之事未置一辭，反而希望高澄、高洋能與諸勳貴合作，把東魏給支撐起來，進而消滅西魏。高歡不必在臨死前還刻意編織謊言，可見其言非虛。<sup>29</sup>既然如此，那麼高歡的遺言為什麼沒有被遵守呢？

### 三、高澄圖謀代魏的根本原因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應注意高澄對孝靜帝態度的變化。高歡在世時，高澄對孝靜帝的態度相當謙遜，<sup>30</sup>可是當高歡一死，他卻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資治通鑑·梁紀十六》載：

始，獻武王（高歡）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每侍宴，俯伏上壽；帝設法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承望顏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及澄當國，倨慢頓甚，使中書黃門郎崔季舒察帝動靜，大小皆令季舒知之。澄與季舒書曰：「癡人比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宜用心檢校。」帝嘗

---

29 從另一角度來看，也可說高歡遺言乃違心之論，以高歡未篡位乃是囿於形勢，苦心栽培其子掌權，正是希望他完成篡位。高歡如權衡形勢，未行禪代，欲讓其子取魏代之，便會如曹操、司馬懿或是宇文泰般，以己身權威逐步為其子掃除阻礙。事實上，高歡不僅優遇元氏及親魏大臣，對孝靜帝更是恭敬備至，臨終前又留下不願其子篡位的遺言，上述舉措皆對高氏移祚踐極相當不利，高洋便深受其害。以高歡之明與布局之久，若欲讓其子移魏鼎，當不致出現如此重大失誤。再者，從外部形勢言之，東魏國力遠勝西魏，梁朝又不成威脅；從內部形勢言之，高歡權威更是當朝無匹，篡位條件遠優於其子，卻仍以人臣終，這便非囿於形勢所能解釋。高歡忠於魏室的詳細論證，請參拙論，〈東魏北齊的政治與文化問題新探〉（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第三章，「北魏正統與東魏政治（上）」，頁71-87。

30 「初生河間王孝琬，時文襄為世子，三日而孝靜幸世子第，贈錦綵及布帛萬匹。世子辭，求通受諸貴禮遺，於是十屋皆滿。」《北史》，卷14，〈文襄敬皇后元氏傳〉，頁520。

獵于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曰：「天子勿走馬，大將軍嗔！」澄嘗侍飲酒，舉大觴屬帝曰：「臣澄勸陛下酒。」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曰：「朕？朕？狗腳朕！」使崔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勞帝，帝亦謝焉，賜季舒絹百匹。<sup>31</sup>

《資治通鑑》描述完高歡對孝靜帝的恭敬姿態後，緊接著敘述高澄對孝靜帝的輕蔑與羞辱，其間的落差相當懸殊。從這裡也可以看出，《資治通鑑》用了一個相當明顯的對比敘述，來表現高歡與高澄在對待孝靜帝態度上的差異。例如，高歡每次侍宴都是以俯身的姿態向孝靜帝敬酒，這是極有禮貌的敬酒方式，反觀高澄，則是「舉大觴屬帝」。胡三省（1230-1302）於此句下有註曰：「舉酒相屬，如儕輩然，無復君臣之敬。」也就是說，高澄是以平輩的方式向孝靜帝敬酒，已不把孝靜帝視為君，也難怪孝靜帝會如此憤怒，認為高澄已有不臣之心。此外，高澄令崔季舒（？-573）毆帝三拳的舉動，更逼使孝靜帝與荀濟（？-547）等人合謀暗殺高澄。<sup>32</sup>

此事雖然很快就被高澄一舉平息，但卻對穩定大局不利。因侯景的兵勢在此時正值顛峰，連高歡認定必能與之匹敵的慕容紹宗都被打敗，<sup>33</sup>高澄幽禁孝靜帝的犯上行為，更讓侯景有名正言順的理由向梁朝請求派

---

31 《資治通鑑》，卷 160，頁 4958-4959。《資治通鑑》對高歡事君態度的敘述，不見《魏書》與《北史》。唐長孺在校勘《北齊書·神武紀》時，注意到《資治通鑑》敘高歡與孝武帝事時多有溢出《北齊書·神武紀》之處。他認為：「司馬光未必能見到《北齊書》原文〈神武紀〉，較大可能是採取《三國史略》或《高氏小史》，但其源仍出於《北齊書》原文。」本文亦可能是司馬光採《三國史略》或《高氏小史》所增補的記載，與《北齊書》原文相差不遠，史料價值應可相信。唐長孺的看法請參見《北齊書》，卷 2，〈神武紀下校勘記〉，頁 25-26。

32 《資治通鑑》，卷 160，頁 4959。

33 「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兩，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墜馬，儀同三司劉豐生被傷，顯州刺史張遵業為景所擒。」《資治通鑑》，卷 160，頁 4968-4969。

兵援助。《資治通鑑·梁紀十六》載：

侯景圍譙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壬申，遣其行臺左丞王偉等詣建康說上曰：「鄴中文武合謀，召臣共討高澄，事泄，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陛下有繼絕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為聖朝之邾、莒，國之男女，為大梁之臣妾。」上以為然，乙亥，下詔以太子舍人元貞為咸陽王，資以兵力，使還北主魏，須渡江，許即位，儀衛以乘輿之副給之。<sup>34</sup>

「河北物情，俱念其主」此言應有一定的依據，否則也不會激起梁武帝經略北方的雄心。<sup>35</sup>因而高澄對孝靜帝的無禮行為，不僅讓侯景可以名正言順地引進南朝勢力，內部人心更為之動盪不安，對穩定大局來說，可以說是百害而無一利的失策之舉。高澄會如此輕賤孝靜帝的原因著實難解，但如果我們試圖貼近高澄內心的想法，或許能發現某些線索。

如前所述，高歡是以極為謙卑的方式，表達對孝靜帝的尊重，然而他對高澄的態度，卻是只要一不滿便動輒毆打。《北史·陳元康傳》載：

神武嘗怒文襄，親加毆蹋，極口肆罵。以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霑地曰：「王教世子過矣！」神武曰：「我性急，瞋阿惠，常如此。」元康大啼曰：「一度為甚，況常然邪！」神武自是為之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又謂左右曰：「元康用心誠實，必

34 《資治通鑑》，卷 160，頁 4967-4968。《梁書》只載：「十二月，景率軍圍譙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又遣其行臺左丞王偉、左民郎中王則詣闕獻策，求諸元子弟立為魏主，輔以北伐，許之。詔遣太子舍人元貞為咸陽王，須渡江，許即偽位，乘輿副御以資給之。」（〔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點校本〕，卷 56，〈侯景傳〉，頁 840）而無說梁武帝之詞。但侯景確曾請梁武帝立元氏子弟為魏主以利北伐，與《資治通鑑》所述吻合。《資治通鑑》應是比對其他史料後才將說詞補上，史料來源如依唐長孺之說，亦可能出自《三國典略》。

35 胡三省於此有註曰：「此杜弼所謂『進孰圖身』者也。帝早在兵間，曾不見此，蓋天奪其鑒也。」可見侯景的口信的確讓梁武帝興起了北伐的雄心，讓他覺得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而積極派兵。

與我兒相抱死。」<sup>36</sup>

高澄雖是孝靜帝的妹夫，<sup>37</sup>可是他的年紀卻比孝靜帝大，<sup>38</sup>更是高歡一生事業的繼承人，但高歡與眾人對他們兩人的態度卻如天差地別，自然會讓高澄心理不平衡。高澄入京輔政後的某些作為，或許就是想與孝靜帝一較高下：如眾人對孝靜帝莫不恭敬，高澄也禮賢下士以塑造人望；<sup>39</sup>孝靜帝曾親自登壇講經，<sup>40</sup>高澄也有兩次命人宣講的紀錄。<sup>41</sup>雖然在文韜方面，高澄能與孝靜帝相比，但在武略方面，高澄遠遠不及。孝靜帝可以雙手抓著石獅子跳過宮牆，騎射的技術更到了「射無不中」的地步，<sup>42</sup>但高澄卻因孝靜帝射獵時的速度太快而不悅，可見任憑高澄如何努力，在這方面也無法與孝靜帝相比。

高歡在世的時候，高澄不敢放肆，但高歡一死，積怨已久的高澄就迫不及待地展現超越孝靜帝之處，來證明自己的優越，那就是手中掌握的冰冷權力。或許如此，才會讓他不顧險峻情勢，百般凌辱孝靜帝，以此發洩心中怨恨。而從高澄對孝靜帝所表現出來的高傲姿態來看，不臣

---

36 《北史》，卷 55，〈陳元康傳〉，頁 1983-1984。

37 「文襄敬皇后元氏，魏孝靜帝之姊也。」《北史》，卷 14，〈文襄敬皇后元氏傳〉，頁 520。但《北史》，卷 6，〈齊文襄紀〉，頁 232 則作：「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以高澄之妻乃孝靜帝之妹，不知孰是。《資治通鑑》亦以高澄之妻為孝靜帝之妹（卷 158，頁 4910），因此採《北史·齊文襄紀》的說法。

38 高澄生於北魏孝明帝正光二年（521），而孝靜帝則生於孝明帝正光五年（524），高澄長孝靜帝三歲。

39 「文襄富於春秋，初總朝政，崔暹每勸禮接名賢，詢訪得失。」《北史》，卷 43，〈邢劼傳〉，頁 1591。

40 「魏靜帝於顯陽殿講《孝經》、《禮記》，繪與從弟騫、裴伯茂、魏收、盧元明等俱為錄議。」《北史》，卷 33，〈李繪傳〉，頁 1207。

41 「崇祖字子述。文襄集朝士，命盧景裕講《易》，崇祖時年十一，論難往復，景裕憚之。（李）業興助成其子，至於忿闕。文襄色甚不平。」《北史》，卷 81，〈李崇祖傳〉，頁 2725。「齊文襄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儒，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誦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北史》，卷 30，〈盧景裕傳〉，頁 1099。

42 《魏書》，卷 12，〈孝靜紀〉，頁 313。



之心已難遮掩，取東魏而代之只是時間問題。但高澄尚未有篡位的動作，乃因此時候景的兵勢正達到鼎盛，高澄要花很多時間應付。也許要到武定六年（548）慕容紹宗擊敗侯景後，<sup>43</sup>高澄才有計畫取代東魏。但高澄的篡位動機，似乎不能簡單以權力野心一筆帶過，或許還有其他的原因，讓高澄必須以篡位的方式來穩定自己的權力基礎。

司馬子如、侯景兩人皆輕視高澄。此外，與高歡舉義於信都的勳貴崔陵，在高歡死後，同樣也質疑高澄的領導能力。《北齊書·崔陵傳》載：

高祖葬後，陵又竊言：「黃領小兒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以陵言告暹。暹啟世宗，絕陵朝謁。陵要拜道左。世宗發怒曰：「黃領小兒，何足拜也！」於是鎖陵赴晉陽而訊之，陵不伏。……（陳）元康曰：「崔陵合死，朝野莫不知之，公誠能以寬濟猛，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乃舍之。陵進謁奉謝，世宗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名作黃領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sup>44</sup>

崔陵（494-554）對高澄的稱呼也與侯景一致，都是用「小兒」這個詞語來表達對高澄的蔑視。高澄當然也知道自己的處境，當聽到崔陵對他能力的質疑時，便想殺之洩憤。陳元康所以能說動高澄原諒崔陵，在於此舉既可顯示他的容人之量，也能提昇執政的聲望。由此可見，即使經過將近十年的輔政，高澄的能力與威望仍不足以服眾，所以他才必須壓抑情緒去包容那些輕視自己的人。從《北史·齊文襄紀》裡，高澄執政後屢屢對權貴、朝士施加恩典的記載，便能看出他想收攬人心的企圖。不僅如此，他甚至對曾響應侯景叛亂的諸州刺史、守、令、佐史也寬大為懷，只誅首惡，其他的人都給予減罪。<sup>45</sup>此舉也是想表現出他能容的雅量，並藉此安撫那些與侯景關係甚密的勳貴。

然而，藉由施恩、減罪來營造人望，畢竟有一定的限度，也難即刻

43 《資治通鑑》，卷 161，頁 4970-4971。

44 《北齊書》，卷 23，〈崔陵傳〉，頁 334-335。

45 《北史》，卷 6，〈齊文襄紀〉，頁 233-234。



扭轉外界對他既有的觀感。因此，高澄勢必要在很短的時間裡提昇自己威望，以去除眾人對他領導能力的質疑。當時，除在戰場上建功立業外，沒有其他方法。恰巧，西魏派遣支援侯景的部隊，在王思政領導下仍然佔據潁川。高澄派遣高岳（512-555）率領大軍前往討伐，以水灌城，卻仍屢攻不下，反而折損了慕容紹宗與劉豐（？-549）兩位名將。<sup>46</sup>陳元康察覺到這是一個良機，於是向高澄提出建言：「公匡輔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sup>47</sup>高澄聽從陳元康建議，順利打下潁川，但高澄並不是一開始就親臨戰陣指揮大軍，而是在高岳等人即將攻陷潁川時，趁機收割戰果，對高澄自身威望的提高自然幫助甚微。

由於高澄不管付出多少努力，始終欠缺讓人信服的威望。因此，高澄便不能像高歡一樣以人臣終，而必須違背高歡的遺訓，藉由明確的制度來保障自己的權力，那就是經由禪代，開創出完全屬於高氏的新政權。

此時也能看到高澄旁邊的人有勸進的動作。《北齊書·陳元康傳》載：「魏朝授世宗相國、齊王，世宗頻讓不受。乃召諸將及元康等密議之，諸將皆勸世宗恭應朝命。元康以為未可。」<sup>48</sup>《資治通鑑·梁紀十八》則作：「甲辰，東魏進大將軍勃海王澄位相國，封齊王，加殊禮。丁未，澄入朝于鄴，固辭；不許。澄召將佐密議之，皆勸澄宜膺朝命。獨散騎常侍陳元康以為未可，澄由是嫌之。」<sup>49</sup>可見，除相國、齊王外，孝靜帝還賜給高澄殊禮。所謂的殊禮，胡三省指出即是《北史·齊文襄紀》載：「（武定）七年四月甲辰，魏帝進文襄位相國，封齊王，綠綬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sup>50</sup>比對《資治通鑑·漢紀三》載胡三省之註：「古者君子必帶劍，所以衛身，且昭武備也。秦法：羣臣上殿，不得持尺寸之兵。草曰菲，麻曰屨，皮曰履。屨、履所以從軍，

46 《魏書》，卷12，〈孝靜紀〉，頁311。

47 《北齊書》，卷24，〈陳元康傳〉，頁344。

48 《北齊書》，卷24，〈陳元康傳〉，頁344。

49 《資治通鑑》，卷162，頁5015。

50 《北史》，卷6，〈齊文襄紀〉，頁235。

軍容不入國，故皆不許以上殿。君前必趨，崇敬也。今賜（蕭）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殊禮也。」<sup>51</sup>便可知「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乃是君王賜予人臣的最高禮遇。

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孝靜帝不但賜予高澄殊禮，更任命他為相國，封為齊王。經查閱《北史·齊神武紀》，可知高歡不但沒有接受過孝靜帝所賜的殊禮，還拒絕了九錫賞賜；他的官爵也只不過是丞相、勃海王、都督中外諸軍事。孝靜帝曾想任命他為相國、尚書事、大行臺，高歡不但堅辭不受，而且在玉壁戰敗之後，還上表請求解除都督中外諸軍事之職。<sup>52</sup>因此高歡生前的官爵只不過是丞相、勃海王而已，若高澄聽從諸將佐之議，接受朝命，那麼便意味他不只在禮儀上，連在官爵上都已超越高歡。此外，受朝廷殊禮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曹操、司馬師（208-255）都曾被授予「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的殊禮，<sup>53</sup>而他們兩人的子孫又分別篡了前朝。從而，諸將佐勸高澄接受殊禮，實意味他們希望高澄能夠效法曹、馬等人的先例受魏禪。

諸將佐積極地勸高澄受魏禪，與現實的政治利益有相當大的關係。《北齊書·陳元康傳》載陳元康與魏收（507-572）議論此事：「觀諸人語專欲誤王。我向已啟王，受朝命，置官僚，元康叨忝或得黃門郎，但時事未可耳。」<sup>54</sup>由此可以瞭解，這些將佐所以積極勸進高澄接受朝命，所著眼的即是一旦高澄篡位成功，便能以參與禪代的大功加官晉爵。這些將佐是哪些人，史書無載，惟不太可能是斛律金之類的勳貴將領，殆

51 《資治通鑑》，卷 11，頁 371。

52 《北史》，卷 6，〈齊神武紀〉，頁 224、225、228、230。

53 「（建安）十七年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三國志》，卷 1，〈魏武紀〉，頁 36。《晉書》則載：「天子詔曰：『……大將軍世載明德，應期作輔。……其登位相國，增邑九千，并前四萬戶；進號大都督、假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劍履上殿；賜錢五百萬，帛五千匹，以彰元勳。』帝固辭相國。」〔唐〕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點校本），卷 2，〈景帝紀〉，頁 28-29。

54 《北齊書》，卷 24，〈陳元康傳〉，頁 344。

可確定。

《北史·齊文襄紀》指高澄入朝堅辭殊禮的時間是在武定七年(549)四月丁未，而高澄於同年五月戊寅率領大軍親征潁川，因此，高澄與諸將佐商議此事必在武定七年四月丁未之後、五月戊寅之前。<sup>55</sup>而據《魏書·孝靜紀》所載：「(武定六年)秋八月甲戌，以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為大行臺，與太尉高岳、司徒韓軌、大都督劉豐等討王思政於潁川，引洧水灌其城。」<sup>56</sup>高岳、韓軌、劉豐、慕容紹宗等人，於武定六年以後一直都在潁川討伐王思政，自然不可能參加武定七年在晉陽的會議。再者，據《北齊書·斛律金傳》載：「侯景之走南豫，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入據潁川。世宗遣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等率眾圍之。復詔金督彭樂、可朱渾道元等出屯河陽，斷其奔救之路。又詔金率眾會攻潁川。」<sup>57</sup>武定六年後，斛律金及彭樂(?-551)、可朱渾道元等人都率軍駐紮在河陽，阻止西魏派兵入援潁川；武定七年五月，高澄親自率軍支援高岳等人攻擊潁川時，才命他們率眾加入潁川戰局，他們也不可能參與會議。所以勸高澄受魏禪的將佐，應是職位低、對權位有熱切渴求的一群人。

更重要的是，陳元康說這些力倡接受殊禮的將佐是害了高澄，理由是「時事未可」。我們必須注意到：陳元康因「便辟善事人，希顏候意」而受高澄寵信，<sup>58</sup>會冒顏直諫，大違其風格，可見其言必然有據。然而此時侯景亂事已平，且趁著戰勝之威，內部已無人敢挑戰高澄的地位，陳元康所言的「時事」就很難理解。但如果將之與前述侯景所言「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聯繫在一起，便可了解這應該就是陳元康所謂的「時事」。

陳元康不惜觸怒高澄的直諫毫無成效，在鞏固自身權力基礎的考量與低階將佐的鼓吹下，高澄已下定代魏的決心。武定七年七月，高澄入

---

55 《北史》，卷6，〈齊文襄紀〉，頁235。

56 《魏書》，卷12，〈孝靜紀〉，頁311。

57 《北齊書》，卷17，〈斛律金傳〉，頁221。

58 《北齊書》，卷24，〈陳元康傳〉，頁343。

鄴都朝覲孝靜帝，請立太子。《資治通鑑·梁紀十八》在此段之後有這樣的敘述：「（高）澄謂濟陰王暉業曰：『比讀何書？』暉業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sup>59</sup>經查閱《魏書·元暉業傳》與《北史·元暉業傳》，都沒有記載高澄與元暉業（？-551）談話的時間，《資治通鑑》應是將高澄請孝靜帝立太子一事，視為其預謀篡位的前奏，元暉業才會以暗喻的方式，勸高澄不要行曹、馬之事；呂思勉亦以為請立太子，乃是高澄為「先行廢立，後乃禪代」所做的布局。<sup>60</sup>請立太子當是高澄欲行篡位之事的先聲。高澄下一步則是想以「遷除朝士」的方式，大舉拉攏朝臣，以換取他們支持篡位之舉。可是，他卻在與陳元康等人商議此事時，被降虜蘭京所殺，禪代計畫遂因此中止。<sup>61</sup>

#### 四、「人心思魏」與高洋篡位時所遭遇的阻礙

高洋是高歡的第二子，史書說他「內雖明敏，貌若不足」或「內雖明察，外若不了」；高歡也認為他長得不好看，沒有散發出聰明人應有的神采；高澄更嘲笑他，說他這樣的外表卻能得到富貴之命，其中原由是相法無法解釋的。<sup>62</sup>由此可知，高洋的外貌並不出色，無法與「美姿容」的高澄相比。<sup>63</sup>高洋又為了逃避兄長的猜疑，常壓抑自己的想法，總是順從高澄的意見，連家人都以為他比不上高澄。<sup>64</sup>高洋為了避禍，

---

59 《資治通鑑》，卷 162，頁 5025。

60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臺北：開明書店，1969），頁 701。

61 《北齊書》，卷 24，〈陳元康傳〉，頁 344-345。

62 《北史》，卷 7，〈齊文宣紀〉，頁 243、244。

63 《北史》，卷 6，〈齊文襄紀〉，頁 236。

64 「文襄年長英秀，神武特所愛重，百僚承風，莫不震懼。而帝善自晦迹，言不出口，恒自貶退，言咸順從，故深見輕，雖家人亦以為不及。」《北史》，卷 7，〈齊文宣紀〉，頁 257。高氏兄弟相形之下，高歡更愛重高澄，且輕視高洋的態度仍無改變，詳情請見前述。

還刻意不修邊幅，竟是一邊流著鼻涕一邊跟高澄議事。<sup>65</sup>這樣的情形，到他跟隨高澄征討潁川時仍無改變。《北史·皇甫玉傳》載：「齊文襄之自潁川歸，文宣從後，玉於傍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指文宣曰：『會是道北垂鼻洩者。』」<sup>66</sup>因此，高洋素來被人所輕視，自然也不足為奇。

不過，高歡很早之前就看出高洋資質不凡，曾經對旁人說：「此兒意識過吾。」<sup>67</sup>然而，高洋在高澄在世時，始終掩飾自己的能力，等到高澄被蘭京等人所暗殺後，他才適時表現出令世人眼睛為之一亮的特質。《北史·齊文宣紀》載：

（武定）七年八月，文襄遇賊，帝在城東雙堂，事出倉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齎斬羣賊而漆其首，祕不發喪。徐言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乃諷魏朝立皇太子，因以大赦。乃赴晉陽總庶政。<sup>68</sup>

高澄被殺事出突然，平時素被眾人輕視的高洋，卻一反常態，鎮靜如常，迅速地指揮軍隊平定蘭京之亂，<sup>69</sup>讓鄴都群臣都為之驚訝不已。此外，他在勳貴重臣的建議下，赴晉陽掌握軍權，離開鄴都前先謁見孝靜帝。《北史·齊文宣紀》載：

及帝（高洋）將赴晉陽，親入辭謁於昭陽殿，從者千人，居前持劍者十餘輩。帝在殿下數十步立，而衛士升階已二百許人，皆攘袂扣

65 「文宣性雌懦，每參文襄，有時洩（涕）出。」《北史》，卷51，〈高浚傳〉，頁1860。

66 《北史》，卷89，〈皇甫玉傳〉，頁2938。

67 《北史》，卷7，〈齊文宣紀〉，頁244。

68 《北史》，卷7，〈齊文宣紀〉，頁244。

69 熊德基與何德章皆懷疑高澄之死乃是高洋所為，何德章更以為這是諸勳貴為了防止崔暹、崔季舒等人因襄贊高澄篡位而掌握大權，轉而支持高洋進行的暗殺行動。但熊、何二人皆未提出足以反駁傳統舊說的直接證據，所舉諸多旁證，卻不免流於揣測，因此關於高澄的死因，仍從《北史·齊文襄紀》的記載。兩位先生的看法，請參見熊德基，〈鮮卑漢化與北朝三姓的興亡〉，收入氏著，《六朝史考實》（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135-136；何德章，〈高澄之死臆說〉，收入武漢大學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6輯（武漢：武漢大學，1998），頁50-56。



刀，若對嚴敵。帝令主者傳奏，須詣晉陽，言訖，再拜而出。魏帝失色，目送帝曰：「此人似不能見容，吾不知死在何日。」<sup>70</sup>

孝靜帝在高澄率領大軍將宮廷團團圍住，命懸人手之時，還能鎮定若常，可知孝靜帝並不是輕易就能被震懾住的皇帝。<sup>71</sup>然而他看著高洋言畢之後離去的背影，竟然會失色地認為高洋必定不能相容，憂慮自己不知死於何日，可見高洋所表現出來的氣勢必定凌駕於高澄之上。不僅孝靜帝有這樣的感覺，當高洋抵達晉陽後，在原本瞧不起他的諸勳貴面前，「神彩英暢，言辭敏洽」，<sup>72</sup>讓眾人一改之前認定高洋比不上高澄的錯誤印象。<sup>73</sup>

高洋由於適時、適當地表現自己，並藉由眾人對他觀感上的極大落差，成功地穩定大局。但是，不久高洋也面臨了與高澄一樣的問題，那就是是否要遵從高歡的遺願，繼續維持東魏政權。我們同樣也能拿審視高澄的標準，來檢驗高洋此時的傾向為何。

首先是高洋對孝靜帝的態度。高洋在接掌政權後，便入宮晉見孝靜帝，卻帶了千餘名衛士隨行，其中竟有十餘人持劍在前。高洋要如此大張旗鼓，除了展示實力外，更想以此澆熄孝靜帝因高澄之死所燃起回復威權的希望。<sup>74</sup>結合上述孝靜帝對高洋的評價，我們也能看出此事背後所隱藏的含意，那就是高洋也與高澄一樣，早在接掌權力的那一刻起就有代魏之心。

---

70 《北史》云「從者千人」（卷7，〈齊文宣紀〉，頁258），《資治通鑑》則作八千人（卷162，頁5027），未知孰是。今暫從《北史》說法。

71 「澄勒兵入宮，見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為。』欲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唯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亡無日，我身且不暇惜，況於妃嬪！必欲弑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啼謝罪。」《資治通鑑》，卷160，頁4959-4560。

72 《資治通鑑》，卷162，頁5027。

73 《北史》，卷7，〈齊文宣紀〉，頁258。

74 「澄死間漸露，東魏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今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資治通鑑》，卷162，頁5027。



即使如此，卻仍有難以理解之處，如高洋於武定七年八月才赴晉陽，接替高澄執掌政權，到了武定八年三月就亟欲行禪代之事，間隔竟不到八個月。<sup>75</sup>縱然高洋早有篡位之心，可是在付諸實行時卻不須如此躁進，應等權力更加穩固時再行易代之事。如此，不僅可以完成高澄生前拉攏鄴都朝臣的計畫，還能在晉陽逐步強化自己的聲勢，為禪代之事掃除障礙。但高洋卻反其道而行，不顧權力未穩的現實，執意在很短的時間裡遂行代魏之事。從而，高洋的野心只是原因之一，應有其他因素讓他無法從容布局，而必須急於篡位。

在高澄去世之前，除了高歡等少數人以外，大多數的人對高洋的觀感並不好。不僅老臣、宿將輕視他，<sup>76</sup>勳貴高隆之（494-554）更常常欺負他，<sup>77</sup>母親婁昭君對他的評價也是「懦直」二字。<sup>78</sup>因此當高洋突然脫胎換骨，展現自己處變不驚的決斷力時，旁人才會如此驚訝。但眾人縱然不再輕視高洋，他在軍政方面仍然是缺乏經驗的人，<sup>79</sup>因而高洋也和高澄相同，即使大權在手，卻缺乏如同高歡般令人肅然起敬的威望。以致司馬子如、高隆之等人為報崔暹（？-559）、崔季舒掃除貪瀆的舊怨，而惡意陷害兩人時，高洋明知崔暹與崔季舒二人無罪，且崔季舒還對穩定政局有相當傑出的貢獻，<sup>80</sup>卻仍不敵司馬子如與高隆之的壓力，下令鞭崔季舒、崔暹二人各兩百下，並遠徙邊疆。<sup>81</sup>

75 《北史》，卷7，〈齊文宣紀〉，頁244-245。

76 《北史》，卷7，〈齊文宣紀〉，頁244。

77 《北齊書》，卷18，〈高隆之傳〉，頁237。

78 《資治通鑑》，卷163，頁5042。

79 據《北史》載：「天平二年，封太原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武定五年，……魏帝授帝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卷7，〈齊文宣紀〉，頁244）高洋所任雖皆要職，然而從上述高洋拚命隱晦的舉動來看，他在這些職位上似乎沒有表現出亮眼的成績，否則老臣、宿將應不會如此輕視他。

80 「世宗暴崩，事出倉卒，羣情草草。勳將等以纘戎事重，勸帝早赴晉陽。帝亦回遑不能自決，夜中召楊愔、杜弼、崔季舒及德政等，始定策焉。」《北齊書》，卷30，〈高德政傳〉，頁407。

81 《北齊書》，卷39，〈崔季舒傳〉，頁512。

高洋不僅威望不能服眾，在現實上，高洋所面對的情況還比高澄來得更糟。高澄初執政時，雖有侯景席捲河南諸州的反叛，但他並非倉促應付這場變局，高歡在去世前就已留下平定侯景的計策，也一併把他對諸將的瞭解，一五一十地交代給高澄。因此，高澄縱使沒有指揮大規模作戰的經歷，卻也能順利地平定侯景叛亂。此外，高澄本身在鄴都輔政將近十年，處理政務可以說相當熟練，所缺少的只是指揮軍隊的經驗。

可是高洋卻不同，高澄被暗殺一事來得太突然，高洋雖即刻斬殺蘭京及其同黨，並封鎖消息，順利將高澄之死對政局的衝擊減到最低。但是，高洋除了高德政等親信幕僚以外，值得信任的人並不多。何況，縱使以出色才華暫時穩住陣腳，高洋卻仍需一段時間來學習如何執政。更重要的是，高澄並非一個人獨撐大局，還有高洋做為政務上的輔佐，讓他能全心準備因應侯景或是西魏的戰事；但高洋此時無足以輔翼他的兄弟，同母弟、後被譽為賢王的高演（535-561），在武定七年時才十六歲，又毫無政事歷練，根本難以承擔重任。<sup>82</sup>所以，當高洋赴晉陽執掌軍權之際，便不得不將鄴都委託給高岳、高隆之、楊愔（511-560）等人。<sup>83</sup>

因而，高洋對本身所掌握的權力其實仍缺乏自信，徐之才看出了這一點，便積極勸高洋受魏禪。《北史·齊文宣紀》載：

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且讖云『羊飲盟津角拄天』，盟津水也，羊飲水，王名也，角拄天，大位也。又陽平郡界面星驛傍有大水，土人常見羣羊

---

82 高演的卒年，據《北史》所載：「（皇建）二年十一月甲辰……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卷7，〈齊孝昭紀〉，頁271）皇建二年為西元561年，高演當生於東魏天平三年（535），因此在武定七年時，高演時年十六歲。又，《北史》，卷7，〈齊孝昭紀〉，頁266-267載：「魏元象元年（538），封常山郡公。……天保初，進爵為王。五年（555），除并省尚書令。」

83 《北齊書》，卷13，〈高岳傳〉，頁175；《北史》，卷54，〈高隆之傳〉，頁1946；《北齊書》，卷30，〈高德政傳〉，頁407。

數百，立臥其中，就視不見，事與識合，願王勿疑。」<sup>84</sup>

高洋雖說自己不敢僭越父兄的典範，可是從上述分析可知，他早在繼承大權的那一刻起就有篡位之心。因此，高洋會這樣說，並不是他真心認為東魏不能篡，而是已預料到此舉必定會引起輿論反彈，外界有可能以高歡與高澄皆以人臣終的往例，反對篡位。<sup>85</sup>此外，我們從徐之才打動高洋的言論也可瞭解，高洋會那麼急於取魏代之，除了個人的權力野心外，還有藉此提升領導威望的打算，這和高澄不惜違背父訓，欲行篡位之事的考量也是一致的。

與高澄時的情況類似，此時高洋身邊也有人在運作勸進之事。除了前述的徐之才，宋景業、陳山提的家客楊子術等人，也都以讖緯的方式勸高洋接受魏禪。在徐之才正式勸進前，突然出現暗示高洋當受天命的讖語，徐之才等人經由高德政的管道，將這些暗示性極強的讖語傳達給高洋，高德政也趁機向高洋勸進。<sup>86</sup>

高德政是勃海薊縣人，初次任官就是擔任高洋的開府參軍，除了一段時間擔任高歡的相府掾以外，都是在高洋身邊任職。史書以「舊相昵愛，言無不盡」來形容他與高洋的關係；<sup>87</sup>徐之才本是梁朝人，後因被

84 《北史》，卷7，〈齊文宣紀〉，頁258。

85 《北齊書》，卷30，〈高德政傳〉，頁407。

86 「時訛言上黨出聖人，帝聞之，將徙一郡。而郡人張思進上言，殿下生於南宮，坊名上黨，即是上黨出聖人，帝悅而止。先是童謠曰：『一束蒿，兩頭然，河邊羖羖飛上天。』蒿然兩頭，於文為高；河邊羖羖為水邊羊，指帝名也。」《北史》，卷7，〈齊文宣紀〉，頁258。北齊常見以童謠所進行的政治鬥爭，如祖珽為了要鬥倒斛律光，就與西魏將領一搭一唱，製造斛律光欲謀反的謠言。《北史·斛律光傳》載：「周將韋孝寬懼光，乃作謠言，令間諜漏之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樹樹不扶自豎。』珽續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母。令萱以饒舌為斥己，盲老公謂祖珽也，遂協謀，以謠言啟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可畏。』」《北史》，卷54，〈斛律光傳〉，頁1969-1970。由此可見，路邊所流傳的童謠往往都是野心家為了政治目的而授意傳唱，祖珽以此法陷害斛律光，而徐之才、宋景業為了勸說高洋篡位而編造童謠，亦不無可能。

87 《北齊書》，卷30，〈高德政傳〉，頁406-407。

俘轉而出仕北魏，在東魏任職秘書監；高洋執政後，楊愔認為他是南人，不能承擔秘書監的職任，便轉授他為金紫光祿大夫；<sup>88</sup>楊子術其人事跡不詳，但收容他的陳山提本是高氏的蒼頭出身，與高洋的關係匪淺。<sup>89</sup>宋景業則為廣宗人，他不但明解《周易》，更擅長陰陽緯候之學。<sup>90</sup>

高德政會積極勸高洋行篡位之事，對權力的渴求應是重要的原因。他在高洋受禪之前的官職不過只是相府司馬，專知門下事。然而在禪代之後，馬上被任命為侍中，不久又兼吏部尚書，最後甚至還被任命為尚書右僕射。<sup>91</sup>如果高洋不篡位，以高德政的資歷，不太可能這麼快就能爬到高位。至於徐之才，谷川道雄認為他會積極鼓吹高洋篡位，最主要的因素在於他被楊愔所排擠，於是便試圖以勸高洋受禪來挽救自己的地位。<sup>92</sup>他在高洋禪代後，就被任命為侍中，並受封為池陽縣伯。因此徐之才的確也藉著鼓吹禪代，不僅一雪被楊愔排擠的恥辱，更得到了極大的政治利益；陳山提則從蒼頭躍升為都督；<sup>93</sup>至於宋景業，似乎只是徐之才為了強化勸進效果所找來的江湖術士，高洋雖然對賀拔仁（？-570）等人稱讚他為帝王之師，可是在禪代後高洋卻只回報以散騎侍郎的官位與長城縣子的爵位。<sup>94</sup>可見宋景業在勸進高洋的行動中不過為配角，主謀仍是高德政與徐之才，而他們又都是為了現實政治上的利益，才積極勸高洋行禪代之事，這和勸高澄受魏禪的將佐們所抱持的立場一致。

高洋在下定受魏禪的決心之後，便把此事告訴母親婁昭君，期盼能得到她的支持。但是婁昭君不但不贊同，還以高洋預料中的理由潑了他一頭冷水，認為：「汝父如龍，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

---

88 《北史》，卷 90，〈徐之才傳〉，頁 2970。

89 《北史》，卷 92，〈恩幸傳〉，頁 3055。

90 《北史》，卷 89，〈宋景業傳〉，頁 2934。

91 《北齊書》，卷 30，〈高德政傳〉，頁 409。

92 谷川道雄著，李濟滄譯，《隋唐帝國形成史論》，頁 205。

93 《北史》，卷 32，〈崔暹傳〉，頁 1190。

94 《北齊書》，卷 49，〈宋景業傳〉，頁 676；《北史》，卷 89，〈宋景業傳〉，頁 2935。

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sup>95</sup>堅決反對高洋篡位。<sup>96</sup>高洋在婁昭君的阻擋之下，雖覺得氣餒，但仍不放棄希望，便鑄金人為己像，沒想到一鑄即成，這無疑增強高洋代魏的信心，<sup>97</sup>於是便派段韶到肆州詢問斛律金的意見。斛律金聽到高洋欲受魏禪的消息，急忙親赴晉陽，力陳不可代魏之理；並以宋景業乃是上呈符命的第一人，請求高洋殺了他。<sup>98</sup>高洋便與以斛律金為首的諸勳貴，在婁昭君面前商議受魏禪一事。婁昭君對諸勳貴說，高洋的個性儒直，代魏一事必定不是他的本心，一切都是幸災樂禍的高德政唆使，明確向眾人表達自己反對禪代的立場。<sup>99</sup>但此時高洋已下定篡位決心，先派高德政赴鄴都尋求群臣支持，而高德政努力勸說，卻連一個應和的人都沒有。<sup>100</sup>可見，鄴都群臣與婁昭君及諸勳貴的立場一致，都反對高洋為了一己私心而僭越臣位。

然而，高洋心意已決，在高德政還未返回晉陽報告鄴都的人心動向前，他已擁兵東向鄴都。到了平都城，高洋召集諸勳將告以禪代事，諸勳將突然聽聞此事的反應也是「皆愕然，莫敢答者」。<sup>101</sup>杜弼在此時挺身直言，《北齊書·高德政傳》載：

時杜弼為長史，密啟顯祖云：「關西是國家勁敵，若今受魏禪，恐其稱義兵挾天子而東向，王將何以待之？」顯祖入，召弼入與徐之才相告。之才云：「今與王爭天下者，彼意亦欲為帝，譬如逐兔滿市，一人得之，眾心皆定。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心。縱欲屈

95 《資治通鑑》，卷 163，頁 5042。

96 「文宣將受魏禪，后固執不許，帝所以中止。」《北史》，卷 14，〈武明皇后婁氏傳〉，頁 517。

97 《北史》，卷 7，〈齊文宣紀〉，頁 258。

98 《北史》，卷 7，〈齊文宣紀〉，頁 258。

99 「乃議於太后前。太后謂諸貴曰：『我兒癡直，必自無此意，直高德正〔政〕樂禍，教之耳。』」《北史》，卷 7，〈齊文宣紀〉，頁 258。《北齊書》亦載婁昭君反對高洋篡位語，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終，汝何容欲行舜、禹事？此亦非汝意，正是高德政教汝。」《北齊書》，卷 30，〈高德政傳〉，頁 408。

100 《北史》，卷 7，〈齊文宣紀〉，頁 258。

101 《北齊書》，卷 30，〈高德政傳〉，頁 407。



強，止當逐我稱帝。必宜知機先覺，無容後以學人。」弼無以答。<sup>102</sup>杜弼（491-559）是高歡的核心幕僚，高洋執政後，他做為高洋的長史，「志在匡贊，知無不為」，<sup>103</sup>但他卻反對高洋篡位。不過，杜弼所舉的理由明顯悖離現實：對內，侯景亂平後，內部再也沒有任何一股勢力能挑戰高氏；對外，東魏的國力又強於西魏。此後，宇文泰得知高洋稱帝的消息，雖然出兵，但一看到高洋治軍有方、軍心不亂，在兩軍交戰前便即刻撤軍，正是一例。<sup>104</sup>因此，當徐之才反駁杜弼的質疑時，杜弼竟然無法舉出其他理由加以回擊。

縱使東魏的國運將盡，眾人卻沒有放棄挽救魏室的最後一絲希望。司馬子如從鄴都來見高洋，力勸不可代魏；杜弼則抱馬苦諫高洋，希望他回心轉意。<sup>105</sup>賀拔仁等勳貴將領則又重提斛律金之議，請求高洋殺宋景業以謝天下。<sup>106</sup>連高歡的堂弟高岳等人也不贊成高洋篡位。<sup>107</sup>《北齊書·高德政傳》載：

帝已遣馳驛向鄴，書與太尉高岳、尚書令高隆之、領軍婁叡、侍中張亮、黃門趙彥深、楊愔等。岳等馳傳至高陽驛。帝使約曰：「知諸貴等意，不須來。」唯楊愔見，高岳等並還。帝以眾人意未協，……又說者以為昔周武王再駕盟津，然始革命，於是乃旋晉陽。自是居常不悅。<sup>108</sup>

102 《北齊書》，卷 30，〈高德政傳〉，頁 407。

103 《北齊書》，卷 24，〈杜弼傳〉，頁 347-351。

104 「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帝聞帝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退師。庚午，還宮。」《北齊書》，卷 4，〈文宣紀〉，頁 54。

105 《北史》，卷 7，〈齊文宣紀〉，頁 258。

106 「高德政、徐之才並勸文宣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都城，諸大臣沮計，將還。賀拔仁等又云：『宋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北史》，卷 89，〈宋景業傳〉，頁 2935。賀拔仁「以帳內都督從神武破尔朱氏於韓陵，力戰有功」，《北史》，卷 53，〈賀拔仁傳〉，頁 1909。

107 《北齊書》，卷 13，〈高岳傳〉，頁 174。

108 《北齊書》，卷 30，〈高德政傳〉，頁 407-408。



上述諸人中，高隆之因參與舉義有功，被高歡認為從弟而賜姓高；<sup>109</sup>婁叡（531-570）是婁昭君的姪子，高洋的表兄弟；<sup>110</sup>張亮是高歡、高澄委以心腹之任的親信；<sup>111</sup>趙彥深（507-576）則是司馬子如的賤客出身，後被司馬子如推舉為高歡的丞相府功曹參軍，而受高歡所看重，高澄執政後更委之以後事。<sup>112</sup>這些人都反對高洋代魏，所以當高洋知道他們的立場後，就請他們不用至平都城議事。

從上述分析可知，高澄入京輔政前所謂的「鄴都四貴」——孫騰（481-549）、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sup>113</sup>除了孫騰已死外，<sup>114</sup>其他三人都不贊同高洋受魏禪。斛律金、賀拔仁等與高歡一起出生入死的勳貴將領，也持反對立場，鄴都群臣亦期期以為不可；加上高氏一族的長輩婁昭君，更明確表達堅決否定的態度。這股排山倒海般的壓力，已經讓高洋無法承受，<sup>115</sup>只好援引周武王的先例做為下臺階，悻悻然地回到晉陽。但高洋早在此時已為日後再起做好準備，只接見楊愔就是很重要的伏筆。

楊愔是高歡之婿，跟高澄、高洋有親戚關係。他曾當過高洋的開府司馬，時間似乎不長，後來就隨高澄赴鄴都輔政。楊愔在高澄的提拔下，被任命為吏部尚書，高澄把自己曾擔任的重要職位讓給楊愔，便可知他對楊愔的器重。<sup>116</sup>楊愔曾參加高澄為篡位所舉行的祕密會議，且僥倖未

109 《北齊書》，卷 18，〈高隆之傳〉，頁 235。

110 《北史》，卷 54，〈婁叡傳〉，頁 1955。

111 《北齊書》，卷 25，〈張亮傳〉，頁 360-361。

112 《北史》，卷 55，〈趙彥深傳〉，頁 2006-2007。

113 「騰早依神武，神武深信待之，置於魏朝，寄以心腹……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北史》，卷 54，〈孫騰傳〉，頁 1944。

114 孫騰薨於武定六年（549）四月。《北齊書》，卷 18，〈孫騰傳〉，頁 235。

115 「帝欲還，尚食丞李集曰：『此行事非小，而言還？』帝偽言使向東門殺之，而別令賜絹十疋。」《北史》，卷 7，〈齊文宣紀〉，頁 258-259。高洋必須假裝除去支持篡位的尚食丞李集，當時所承受壓力之大，亦可想而知。

116 「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侍學典選如故。」《北史》，卷 41，〈楊愔傳〉，頁 1502。

死，隨後並幫助高洋穩定政局。<sup>117</sup>當高德政等人勸高洋要受魏禪時，就請高洋寫信給楊愔，希望他能支持篡位。為什麼高洋必須寫信給楊愔？或許是因高洋、高德政等人與鄴都朝臣並沒有很深的交往，而禪代之事又必須在朝臣的幫助下才能推行。楊愔是高洋的親戚，又曾任職於其下，更重要的是，他長期任職於吏部，與朝臣一直維持著良好的關係，如果他支持高洋篡位，高洋便可以利用他在鄴都的人際網絡，動員朝臣參與禪代工作。

高德政在高洋寫信給楊愔後，卻仍擔心楊愔會猶豫不決，竟親自到鄴都探詢楊愔的想法。曾經參與高澄禪代計畫的楊愔，此時卻要等高德政單獨跟他深談後，才遲遲與之應和，<sup>118</sup>態度實不尋常，令人難以理解。但若考慮到高澄如果不死，楊愔將是提議禪代的第一功臣，而不是高德政；再者，楊愔的資歷還在高德政之上，此時高德政已是新貴，自己卻是舊人，心態自然不能平衡。高德政似乎也意識到這一點，所以才親自到鄴都說服楊愔。日後，楊愔要致高德政於死地，與他內心一直記恨此事密切相關。<sup>119</sup>然而，楊愔畢竟仍把握住高洋受禪的機會，從高洋摒除眾人只與楊愔會面一事，便能發現楊愔的立場已悄然轉變。有他在鄴都籌備禪代事宜，可以讓篡位之事順利不少。

由於篡位受阻，高洋回到晉陽後，常常鬱鬱不樂。徐之才、宋景業仍以讖緯之說勸他應在五月受魏禪，高德政也在旁一直敦勸。高洋令李密、宋景業卜卦，所得的卦象皆指出高洋當為天子。<sup>120</sup>這再次增強了高

117 《北齊書》，卷 30，〈高德政傳〉，頁 407。

118 《北齊書》，卷 30，〈高德政傳〉，頁 407。

119 《北齊書》，卷 30，〈高德政傳〉，頁 409。

120 「洋使術士李密卜之，遇〈大橫〉，曰：『漢文之卦也。』又使宋景業筮之，遇〈乾〉之〈鼎〉，曰：『〈乾〉，君也。〈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洋大悅。」《資治通鑑》，卷 163，頁 5043。所謂漢文之卦，據《史記》所載：「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洋的信心，於是答應高德政的請求，密令魏收撰禪讓詔冊、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sup>121</sup>接著高洋就啟程向鄴都，準備受魏禪。《北齊書·高德政傳》載：

至五月初，帝發晉陽。德政又錄在鄴諸事條進於帝，帝令陳山提馳驛齋事條並密書與楊愔。大略令撰儀注，防察魏室諸王。山提以五日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書崔陵、度支尚書陸操、詹事王昕、黃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之等議撰儀注。六日，要魏太傅咸陽王坦等總集，引入北宮，留于東齋，受禪後，乃放還宅。帝初發至亭前，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大以沉吟。至平都城，便不復肯進。德政、徐之才苦請帝曰：「山提先去，若為形容，恐其漏泄不果。」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眾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sup>122</sup>

我們從途中高洋不肯復向鄴都時，高德政、徐之才以為陳山提已先至鄴都，如果走漏風聲，大事必定無法成功，苦勸高洋要繼續前進，便可知此次行動是在極為保密的情況下進行。高洋還刻意帶了反對禪讓最力的司馬子如與杜弼隨行，似乎想以此麻痺群臣的危機意識，所以當高洋到了鄴都南方準備禪讓的布置時，高隆之還以為高洋這次入朝只是普通的朝覲，完全不明究裡。<sup>123</sup>

高洋所以如此低調，應是記取了之前的慘痛教訓。上次他大張旗鼓地準備篡位，剛開始就被婁昭君堅決否定，緊接著諸勳貴、鄴都朝臣一波又一波的勸阻浪潮，使得高洋不斷受挫，最後不得不屈服於公意，打

---

點校本），卷10，〈孝文本紀〉，頁413-414。因此，高洋所卜之卦為大橫，似乎便暗示他應如同漢文帝一樣當為天子。

121 《北齊書》，卷30，〈高德政傳〉，頁407-408。

122 《北齊書》，卷30，〈高德政傳〉，頁408。

123 「帝至鄴城南，召入，并齋板策。旦，高隆之進謁曰：『用此何為？』帝作色曰：『我自作事，若欲族滅耶！』隆之謝而退。於是乃作圓丘，備法物，草禪讓事。」《北史》，卷7，〈齊文宣紀〉，頁259。

消篡位念頭，回到晉陽。<sup>124</sup>因此高洋這一次便以突襲的方式，在晉陽勳將與鄴都朝臣都無從反應之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短短七天的時間內，便造就情勢底定的既成事實。當高洋派遣司馬子如、杜弼入鄴觀察物情時，眾人見到兩人入京，就知高洋已至鄴都，而楊愔的作為又明顯在為篡位作準備，<sup>125</sup>便知大勢已去，不敢再有反對意見。

楊愔因幫助高洋處理禪代之事，讓高洋對他大加讚賞，奠定他在北齊長期執政的地位。<sup>126</sup>然而我們是否能以此認定，楊愔所召集參與議撰禪位儀注的朝臣們也都贊成高洋篡位呢？如果我們稍加考察，似乎不能一概而論。

楊愔所召集的朝臣共有六人，分別是太常卿邢邵、七兵尚書崔陵、度支尚書陸操、詹事王昕（?-559）、黃門侍郎陽休之（509-582）、中書侍郎裴讓之（?-約 555）。除了陽休之曾勸高歡篡位，<sup>127</sup>以及邢邵態度未明外，其餘四人似乎都對魏室懷有感情。裴讓之後來被高洋所殺，原因在於他與高德政不合，高德政便向高洋密告裴讓之在禪代時「眷戀魏朝，嗚咽流涕」，<sup>128</sup>可見其忠於魏室。崔陵曾在孝武帝即位詔書中直書「朕託體孝文」，而被魏收嗤笑為率直，可見他對孝文帝崇拜之深。<sup>129</sup>被譽為有「孝文風」的孝靜帝，<sup>130</sup>自然也是崔陵景仰的皇帝，何況他跟

124 「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敦喻文宣為相國、齊王。時將受魏禪，發晉陽至平陽郡（平都城），為人心未一，且還并州。」《北史》，卷 47，〈陽休之傳〉，頁 1725。

125 《北齊書》，卷 30，〈高德政傳〉，頁 408。

126 「（楊愔）及居端揆，經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北史》，卷 41，〈楊愔傳〉，頁 1504。

127 「四年，高祖幸汾陽之天池，於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其文曰『六王三川』。高祖獨於帳中問之，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是大王之字，王者當王有天下，此乃大王符瑞受命之徵。既於天池得此石，可謂天意命王也，吉不可言。』高祖又問三川何義。休之曰：『河、洛、伊為三川，亦云涇、渭、洛為三川。河、洛、伊，洛陽也；涇、渭、洛，今雍州也。大王若受天命，終應統有關右。』高祖曰：『世人無事常道我欲反，今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也。』」《北齊書》，卷 42，〈陽休之傳〉，頁 561-562。

128 《北史》，卷 38，〈裴讓之傳〉，頁 1384-1385。

129 《北史》，卷 56，〈魏收傳〉，頁 2026。

130 「帝好文學，……嘉辰宴會，多命羣臣賦詩，從容沉雅，有孝文風。」《魏書》，卷 12，

孝靜帝的私交不錯，常常在侍宴時賦詩。<sup>131</sup>陸操其人，史書雖然沒有記載他對魏室的態度為何，但從他對魏收的《魏書》推崇備至，說魏收有大功於魏室，<sup>132</sup>足見魏室在陸操心中的份量。王昕後來被高洋遠徙幽州，貶為平民，原因在於有人密告王昕常常感嘆水運（即東魏的國祚）不該斷絕。<sup>133</sup>

至於幫高洋撰禪讓詔冊、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的魏收，他對魏室的態度，從《魏書》裡他對孝文帝的推崇，似乎可以略知一二。<sup>134</sup>不僅如此，就連主導整個篡位過程的楊愔，之前也是以家族皆忠於魏室而驕傲自豪的人。楊愔在流亡時，不小心被相州刺史劉誕所捕，劉誕令鞏榮貴押送他返回洛陽。那時楊愔對鞏榮貴說：「僕百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讎。得自縊於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sup>135</sup>可見楊愔原本也是忠於魏室，可是為了掌握大權，必須幫助高澄、高洋實現他們的野心，才一反過去的堅持，轉而支持高洋篡位。這些朝臣在情感上雖眷戀魏朝，但政治現實卻逼使他們不得不以參與禪代的方式，謀求在政界的生存。

可見，除了少數人外，眾人都反對高洋篡位，但大勢已難逆轉，孝靜帝禪位給高洋的過程，顯得格外悲壯。《魏書·孝靜紀》載：

及將禪位於文宣，襄城王旭及司徒潘相樂、侍中張亮、黃門郎趙彥

---

〈孝靜紀〉，頁 313。「孝文風」一詞，《資治通鑑》則作「孝文風烈」（卷 160，頁 4958），似乎更加清楚。

131 《北齊書》，卷 23，〈崔瞻傳〉，336。

132 「尚書陸操嘗謂（楊）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北史》，卷 56，〈魏收傳〉，頁 2032。

133 《北史》，卷 24，〈王昕傳〉，頁 884。

134 「及躬總大政，一日萬機，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至夫生民所難行，人倫之高迹，雖尊居黃屋，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捨，煥乎其有文章，海內生民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才大略，愛奇好士，視下如傷，役己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天地，豈虛諡也。」《魏書》，卷 7 下，〈高祖紀附史臣曰〉，頁 187。

135 《北史》，卷 41，〈楊愔傳〉，頁 1501。



深等求入奏事。帝在昭陽殿見之。旭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姓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斂容答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又云：「若爾，須作詔書。」侍郎崔劼、裴讓之奏云：「詔已作訖。」即付楊愔，進於帝，凡十條。書訖，帝曰：「將安朕何所？復若為而去？」楊愔對曰：「在北城別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帝乃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後宮。」乃與夫人妃嬪已下訣，莫不歔歔掩涕。嬪趙國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已下皆哭。直長趙〔道〕德以故憤車一乘候於東上閣，帝上車，〔道〕德超上車持帝。帝肘之曰：「朕畏天順人，授位相國，何物奴，敢逼人！」趙〔道〕德尚不下。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僚衣冠拜辭，帝曰：「今日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眾皆悲愴，高隆之泣灑。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宅。<sup>136</sup>

孝靜帝覺得自己禪代的過程不會輸給漢獻帝（181-234，189-220 在位）、曹魏常道鄉公（曹魏元帝，246-302，260-265 在位），那麼漢獻帝禪讓給曹丕以及常道鄉公禪讓給司馬炎（晉武帝，236-290，265-290 在位）的情況各是如何呢？關於漢獻帝禪代的過程，據《三國志·魏文紀》所載：

漢帝以眾望在魏，乃召眾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乃為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即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視燎成禮而反。改延康為黃初，大赦。<sup>137</sup>

常道鄉公禪讓給司馬炎的情形，則如《三國志·魏陳留王紀》載：

136 《魏書》，卷12，〈孝靜紀〉，頁314。

137 《三國志》，卷2，〈魏文紀〉，頁62。



十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曆數在晉。詔眾公卿士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于晉嗣王，如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時年二十。<sup>138</sup>

漢獻帝與常道鄉公禪代的過程顯得相當平靜，彷彿只是場劇本都安排好的戲碼，群臣不過在其中扮演早已分配好的角色。應該特別注意的是，漢祚竟然衰弱到像漢獻帝這樣的有德之君退位時，群臣連悲傷的情緒都沒有；<sup>139</sup>曹魏雖然有司馬孚（180-272）這樣的忠臣，<sup>140</sup>可是其餘臣子對於禪代一事，亦如漢獻帝時的群臣一般，冷漠視之。

與漢獻帝、常道鄉公相比，在孝靜帝禪讓給高洋的過程中，卻能看到群臣對孝靜帝的豐沛情感洋溢在禪位儀式中。即便將改朝換代，東魏群臣仍對孝靜帝恭敬有加。<sup>141</sup>而在禪位後，孝靜帝問高隆之是否能與後宮訣別，高隆之竟然說出「今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後宮」如此觸犯當道的話。孝靜帝車駕出雲龍門時，群臣亦皆拜辭。當他們聽到孝靜帝的臨別贈言，已經難以壓抑內心悲傷，高隆之與裴讓之更難過地流下淚來。<sup>142</sup>與漢獻帝、常道鄉公相比，群臣對於孝靜帝的情感顯然更深也更強。因此，我們可以說，群臣根本就不認同「魏德已衰，齊德當興」這樣的禪代理由，也反對高洋為了一己之私，不顧高歡遺願與眾人亟力勸阻，藉由禪代，消滅了人們所衷心仰慕的魏室。所以他們才會對高洋代魏有如此強烈的反感，並對孝靜帝的離去如此依依不捨。<sup>143</sup>

138 《三國志》，卷4，〈魏陳留王紀〉，頁154。

139 「論曰：《傳》稱鼎之為器，雖小而重，故神之所寶，不可奪移。至令負而趨者，此亦窮運之歸乎！天厭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見〔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點校本），卷9，〈孝獻紀〉，頁391。

140 「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歔，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晉書》，卷37，〈司馬孚傳〉，頁1084。

141 在孝靜帝禪位的過程中，有趙道德一人對孝靜帝無禮。然而據《北史》所載，趙道德是死忠於高洋的家奴，孝靜帝也罵他「何物奴」，自然不能列入群臣之列。見《北史》，卷92，〈恩幸傳〉，頁3055。

142 《北史》，卷38，〈裴讓之傳〉，頁1385。

143 「人心思魏」的根源，可以追溯至北魏末期時人對孝文帝的崇拜之風，並在帝位傳承上

群臣對舊朝的反應，能否說乃是人情之常呢？似乎不能這樣理解，因為在新舊政權交替之間，群臣不顧政治現實，表露出對舊主的濃烈情感，不啻是甘冒觸怒新主、身首異處的偌大風險。事實上，群臣眷戀魏室的明確表態，確實讓高洋忌恨不已，更為往後的瘋狂殺戮埋下了血腥的種子。

## 五、「人心思魏」與高洋的恐怖屠殺

高洋雖成功行禪代之事，但人心懷念魏室的氛圍卻依然濃厚，這也決定了元氏的悲慘結局。孝靜帝退位之後，高洋仍不放心，出入時常令他陪侍在側，卻依舊無法消除恐懼。到了天保二年（551），孝靜帝便被高洋毒死。<sup>144</sup>即使如此，只要元氏一族繼續存在，北齊就有東魏復辟的土壤。《北史·元韶傳》載：

（天保）十年（559），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sup>145</sup>

高洋把自己篡東魏與王莽（45B.C.-A.D.23，8-23 在位）篡西漢相比，可知東魏也像西漢一樣，對人心都有強烈的吸引力。此時已是高洋執政的最後一年，到這時他還在煩惱元氏會像劉氏一樣復興，可見人心思魏的氣氛並不因時光流逝而有所消減。在這種情況下，要徹底斷絕元氏的政治影響力，大舉誅殺元氏便是必要的手段。其實早在天保初年時，高洋就已逐步清除元氏在朝中的勢力。除了孝靜帝以外，高歡、高澄執政時

---

具體顯現，尙朱榮、高歡、宇文泰更因之而成霸業。可參見何德章，〈北魏末帝位異動與東西魏的政治走向〉，收入武漢大學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8輯（武漢：武漢大學，2001），頁51-61；拙論，〈東魏北齊的政治與文化問題新探〉，第二章，「『魏祚未衰』與北魏末期政局的演變」，頁7-48。

144 《魏書》，卷12，〈孝靜紀〉，頁314。

145 《北史》，卷19，〈元韶傳〉，頁709。

期平步青雲的元坦，於高洋即位不久，便被流配到北營州；<sup>146</sup>和高澄關係甚篤的元孝友（？-551），則與在東魏頗受重用的元暉業一起被殺；<sup>147</sup>而與高氏有親戚關係，在東魏甚受恩寵的元斌（？-551），則在跟隨高洋北征後被賜死。<sup>148</sup>

高洋在意志清醒之時，誅除元氏的行徑尚稱收斂，但是等到發瘋後，就肆無忌憚。《北史·元韶傳》載：

遂以五月誅元世哲、景式等二十五家，餘十九家並禁止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誅元氏，自昭成已下並無遺焉。或父祖為王，或身常貴顯，或兄弟強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者多得爪甲，都下為之久不食魚。世哲從弟黃頭，使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鷗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畢義雲餓殺之。<sup>149</sup>

元氏死亡人數不止七百二十一人。《北史·齊文宣紀》載：「（天保十年）五月癸未，誅始平公元世（道）、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禁止特進元韶等十九家。尋並誅之，男子無少長皆斬，所殺三千人，並投漳水。」<sup>150</sup>因此，高洋一共殺了元氏三千人，手段之兇殘，令人切齒。

清人王鳴盛（1722-1797）對高洋誅殺元氏有以下評論：

自劉裕始殺故主，蕭道成并滅前代之裔，至高洋之殘酷，則亙古所無。……河陰之難，魏之百官王公卿士兩千餘人皆為爾朱榮所殺，朝室幾為之一空。陽銜之《洛陽伽藍記》第四卷云：「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帝宅，多題為寺。」是也。未及三十年，而元氏子

146 《北史》，卷 19，〈元坦傳〉，頁 694。

147 《北史》，卷 16，〈元孝友傳〉，頁 611。

148 《北史》，卷 19，〈元斌傳〉，頁 701。

149 《北史》，卷 19，〈元韶傳〉，頁 709。即使如此，卻仍有逃過誅殺的元氏。昭成帝子孫元文遙、元景安，以及高演妃父元蠻都躲過這場劫難。分別參見：《北史》，卷 55，〈元文遙傳〉，頁 2004-2005；卷 53，〈元景安傳〉，頁 1928；卷 16，〈元蠻傳〉，頁 600。

150 《北史》，卷 7，〈齊文宣紀〉，頁 256。

孫三千人，又被高洋盡屠殺之。且前代之翦滅，猶不過陰行酖害。此則駢斬於市，男子無少長皆就戮，嬰兒擲於空中，承之以稍，誅戮之慘，一至於此。<sup>151</sup>

王鳴盛指出，高洋對元氏的誅殺，與過去的篡位之君殘殺前朝後裔相比，也是空前的殘酷，但王氏並沒有對高洋如此瘋狂的行徑提出解釋。如同前述，時人對於東魏一朝的眷戀已經達到超越魏晉而能與西漢比肩的程度，因此，高洋取東魏而代之的正當性原本就很薄弱。他在即位後的所作所為，又被批評是比桀、紂更失德的君主，<sup>152</sup>顯然無法樹立令人崇敬的「齊德」，來讓子孫宣揚統治的正當性。是故，若不如此徹底殺戮、斬草除根，在人心強烈眷戀魏朝的氛圍下，如果元氏出了一個如劉秀（漢光武帝）般的人物，北齊恐怕不能免除成為下一個新朝的命運。

高洋不僅大舉殘殺元氏，對那些反對他稱帝、眷戀魏室的重臣也不手軟，一一斬殺，如高隆之。高洋要篡位時，高隆之等人從鄴都赴平都城勸高洋打消篡位的念頭。後來在孝靜帝退位時，高隆之不顧得罪高洋的危險，向孝靜帝說「今天下猶陛下之天下」，並為之灑泣，由此可見他對孝靜帝的情感之深。當高洋得知高隆之在酒酣耳熱之際，對元旭（？-554）說：「與王交遊，當生死不相背」，便無法再予以包容，令人拳毆高隆之百下致死。<sup>153</sup>而元旭在高隆之死前四天就被賜死，<sup>154</sup>可見高洋是刻意地要幫高隆之實踐他對元旭的承諾。

杜弼則是另一個例子。當高洋與諸位大臣商議禪讓事，無人敢逆鱗直諫，只有杜弼站出來質疑高洋的代魏計畫。而高洋決心到鄴都受魏禪時，杜弼又抱著高洋所乘之馬，拚命勸阻，希望他不要篡位。杜弼日後

151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臺北：大化出版社，1977），卷68，〈高洋大誅元氏條〉，頁699-700。

152 「曾有尚食丞李集面諫，比帝有甚於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北史》，卷7，〈齊文宣紀〉，頁262。

153 《北齊書》，卷18，〈高隆之傳〉，頁237。

154 《北齊書》，卷4，〈文宣紀〉，頁59。

被高洋所殺，表面上是因他向高洋說過：「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讓高洋以為杜弼譏笑他。而且，杜弼又得罪高德政，導致高德政在高洋面前進獻讒言，高洋大怒，便派人殺了杜弼。<sup>155</sup>然而，這些都只是導火線，更為關鍵的原因似乎還是李百藥（李德林，565-648）所言：「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怒未怠，卒蒙顯戮。」<sup>156</sup>可見，杜弼早在反對高洋篡位的當下，就已種下禍因，歧視鮮卑之言不過是高洋用來殺他的藉口。

其他反對高洋篡位的重臣，雖然沒有像高隆之、杜弼一樣慘遭殺身之禍，也受到嚴厲的處罰，如司馬子如。高洋抵達平都城時，司馬子如從鄴都前往迎接，便勸他不能受魏禪；高洋即位之後，就藉故免去司馬子如的官職。<sup>157</sup>而之前力主殺鼓吹禪代的宋景業以謝天下的賀拔仁，在高洋遠征柔然的戰役中，因不遵守指揮、調度緩慢，而被拔去頭髮，免為庶人，負炭輸送至晉陽宮。<sup>158</sup>他們犯的過錯都不大，但是懲罰卻很重，雖然沒有確切證據，但從高洋睚眦必報的性格來看，<sup>159</sup>很難不把他們得罪高洋的原因與其反對篡位的態度聯想在一起。

此外，鄴都文臣也有因心向魏室、反對篡位而被誅戮的人，如裴讓之。他雖然參掌禪代儀注，但是在孝靜帝退位時，卻悲不自勝地流下淚來。後來，與他素來不睦的高德政在高洋面前揭發此事，高洋大怒之下，便殺了裴讓之。高洋對裴讓之的恨意之深，連權傾一時的楊愔要替他說情都不可得。<sup>160</sup>被人密告「每嗟水運不應遂絕」的王昕，則被貶為平民，

155 《北齊書》，卷 24，〈杜弼傳〉，頁 353。

156 《北齊書》，卷 24，〈杜弼傳〉，頁 354。

157 《北史》，卷 7，〈齊文宣紀〉，頁 248。

158 《北史》，卷 7，〈齊文宣紀〉，頁 251。

159 《北齊書》，卷 4，〈文宣紀〉，頁 68。

160 「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密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流涕，比為內官，情非所願。』既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冢邪！』於是無敢言者，事奏，竟賜死於家。」《北史》，卷 38，〈裴讓之傳〉，頁 1385。



遠徙幽州。<sup>161</sup>

高洋內心對於元氏的深切忌憚，促使他必須努力剷除眷戀前朝的大臣，以排除任何有助於元氏再起的因素。這種恐懼發展到後來，連親信重臣只要與元氏扯上關係，也不免身首異處。《北齊書·高德政傳》載：

顯祖末年，縱酒酣醉，所為不法，德政屢進忠言。後召德政飲，不從，又進言於前，諫曰：「陛下道我尋休，今乃甚於既往，其若社稷何，其若太后何！」帝不悅，又謂左右云：「高德政恆以精神凌逼人。」德政甚懼，乃稱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為退身之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其病何似？」愔以禪代之際，因德政言情切至，方致誠款，常內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即自差。」帝從之，德政見除書而起。帝大怒，召德政謂之曰：「聞爾病，我為爾針。」親以刀子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捉刀不敢下。帝起臨階砌，切責桃枝曰：「爾頭即墮地！」因索大刀自帶，欲下階。桃枝乃斬足之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政於門下，其夜開城門，以輿送還家。旦日，德政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於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遂曳出斬之。時妻出拜，又斬之，並其子祭酒伯堅。德政死後，顯祖謂羣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漢，除鮮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為諸元報讐也。」<sup>162</sup>

高德政乃是高洋從藩邸以來的寵臣，也是首倡受禪的功臣，忠誠應無可置疑，最後卻仍被高洋所殺。其中原因，據高洋所稱，乃是因為高德政常勸高洋要多用漢人，排斥鮮卑人。此外，高洋並認為高德政是誅殺元氏的始作俑者，殺高德政乃是為元氏報仇。

細思高洋所言，可知其中多屬推卸之詞。高德政固然建議多用漢人，但是在任官上，最終決定權仍在高洋。高洋本來就欣賞漢人官員，他所重用的臣子，如楊愔，出身弘農楊氏，在高洋即位後，久居相位執掌機

161 《北史》，卷24，〈王昕傳〉，頁884。

162 《北齊書》，卷30，〈高德政傳〉，頁409-410。

樞。<sup>163</sup>崔暹，出身博陵崔氏，他的兒子在高洋的主持之下，娶高澄之女為妻，與高洋有親戚關係；崔暹本人在天保末期亦官至尚書右僕射，當高洋發瘋、眾人束手無策時，只有崔暹敢向高洋勸誡。<sup>164</sup>崔季舒，出身博陵崔氏，高洋稱帝後大被恩遇，被任命為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sup>165</sup>崔昂（？-565），出身博陵崔氏，高洋譽之為國家柱石，捨不得放他外任，並表示一定會任命他為僕射；不久，高洋就任命崔昂為兼右僕射；不過數天時間，又把他真除為尚書右僕射。<sup>166</sup>他們都是不折不扣的漢人，雖在高澄執政時期就受到賞識，然而真正被任命要職，卻是在高洋統治時期。因此，把提議任用漢人、排斥鮮卑人的罪過完全歸咎於高德政，似乎不太公平。而且，如果把用漢人、排斥鮮卑人視為死罪，那麼高洋本身也難逃死刑之誅，可見他自己都無法自圓其說。

高洋殺高德政的另一個理由更顯得荒唐。就算是因高德政之議，高洋才誅殺元氏，也是高洋乾綱獨斷的決定，政治責任應由兩人共同承擔，怎能完全推託到高德政身上？更何況，高德政建議誅殺元氏，正是他忠於高洋的表現，高洋突然轉向同情元氏，並否定高德政，毫無道理可言。可見高洋的說詞應是為掩飾誅殺親信的真實原因，才刻意編織罪名，搪塞眾人的疑問。那麼高洋為何要殺高德政呢？我們應注意到，高洋在得知高德政欺騙他後，雖然怒氣沖沖地命劉桃枝斬斷高德政的三根腳趾，卻仍留有分寸，沒有當下賜死，而是令他回家休養。會置高德政於死地，是因之後在他的宅邸中發現了諸元的賄賂。高德政之前曾勸高洋殺諸元，高洋卻發現他竟私下收受諸元的賄賂，兩邊都要獲得好處，才會在大怒下痛下殺手。

由上述分析可知，即使到臨終前，高洋仍須以殘殺元氏與親元氏大臣的非常手段，保證在他死後，北齊不會重蹈新莽覆轍。這亦反映出高

---

163 《北史》，卷41，〈楊愔傳〉，頁1504。

164 《北史》，卷32，〈崔暹傳〉，頁1190-1191。

165 《北史》，卷32，〈崔季舒傳〉，頁1185。

166 《北史》，卷32，〈崔昂傳〉，頁1181。

洋統治時期人心眷戀魏室的氛圍依然濃厚，從而對北齊初期政治的發展產生影響。

## 六、結論

高歡臨死前念念不忘兩件事：一是希望高澄與高洋兄弟能與諸勳貴一起同心協力支撐東魏政權；二是要高澄替他完成消滅西魏的理想。可是單單第一件事高澄就沒有辦法做到。首先，高澄因個人的複雜情結作祟，竟對孝靜帝大加凌辱，逼使孝靜帝與荀濟合謀暗殺他，致使政權內部動盪不安；其次，高澄沒有高歡那般能讓眾人心服的威望，縱使在鄴都輔政將近十年，卻始終被人輕視；再者，他也沒有指揮軍隊作戰的經驗，雖有征伐潁川的功勞，卻是趁機而取，也很難讓那些素來瞧不起他的諸勳貴服氣。因此，藉由篡位的手段，以制度來鞏固權勢，便成為必要之舉。再加上低階將佐基於對權力的渴求，從旁慫恿，更加堅定了高澄篡位的決心。可是在禪代的關鍵時刻，高澄卻被降虜蘭京暗殺，禪代計畫也戛然而止。

高洋也與高澄面臨同樣的問題。高洋過去隱晦太過，使得人人都瞧不起他。高澄死後，他雖以臨危不亂的姿態，迅速穩定政局，並至晉陽執掌軍權，然而處境卻比高澄更加惡劣。高澄還有將近十年的輔政經驗，高洋卻沒有他這樣的條件；高澄有高洋幫忙坐鎮鄴都，可是高洋卻沒有能協助處理政務的兄弟；再加上高洋的威望與勢力都無法在短時間內鞏固權力基礎。所以，他也必須走向跟高澄一樣的路，以建立新政權的方式來保障自己的權力。因此高洋才會在徐之才、高德政等人的鼓動下，於執掌大權後不久，便急欲行代魏之事。

高澄篡位的圖謀似乎只有少數人知道，高洋卻是大張旗鼓地欲行禪代之事，此舉遭遇強大的反對聲浪。不僅勳貴與鄴都朝臣反對，連母親婁昭君都以「天位不可妄據」為由，堅決不允，高洋無法承受這股龐大的壓力，只好回晉陽圖謀再舉。眾人之所以力阻高洋篡位，並不是嫌棄

高洋的能力平庸、性格懦直，而是根本就不認為人心所向的東魏政權應該被取代。然而，高洋為了彌補自身威望與權力基礎的不足，終究還是以突襲的方式，排除龐大的反對聲浪，毅然取東魏而代之。

高洋的稱帝，固然在制度面保障了權勢，卻無法立即強化聲望，他依然是欠缺威望的君主。孝靜帝雖退位，我們從他離宮時群臣悲傷流涕的場景，可知眾人對魏室仍眷戀不已。即便在建政後，高洋還一直與此進行戰鬥，甚至不惜以殘酷的殺戮，欲絕後患。儘管如此，高洋直到臨死前，才徹底擺脫這如惡夢般的糾纏。

（責任編輯：林宗閣 校對：林盈君 傅 揚）

## 引用書目

### 一、史料文獻

-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點校本。
- 〔魏〕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點校本。
-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點校本。
-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點校本。
- 〔唐〕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 點校本。
- 〔唐〕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點校本。
- 〔唐〕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點校本。
- 〔唐〕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點校本。
- 〔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點校本。
-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 點校本。
-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臺北：大化出版社，1977。

### 二、近人著作

- 王怡辰，《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
- 田餘慶，〈關於曹操的幾個問題〉，收入氏著，《秦漢魏晉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2004。
-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臺北：開明書店，1969。
- 呂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7。
- 何德章，〈高澄之死臆說〉，收入武漢大學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16 輯。武漢：武漢大學，1998。
- 何德章，〈北魏末帝位異動與東西魏的政治走向〉，收入武漢大學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18 輯。武漢：武漢大學，2001。
- 胡勝源，〈東魏北齊的政治與文化問題新探〉。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 熊德基，〈鮮卑漢化與北朝三姓的興亡〉，收入氏著，《六朝史考實》。北京：中華書局，2000。
- 〔日〕谷川道雄著，李濟滄譯，《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Reminiscence in the Wei Dynasty and Succession between Wei and Qi Dynasty

Hu, Sheng-Yuen\*

### Abstract

When Gao Yang (高洋) planned to establish the Northern Qi and thus replace the Eastern Wei Dynasty, he met with widespread opposition. One general explanation of the academic circle is that he was the scorn of people. This study proposes another explanation: Gao Huan (高歡) had wished that, before his death, Gao Cheng (高澄), brother Gao Yang, and the nobles would together maintain the Eastern Wei Dynasty. In bolstering their personal prestige, Gao Cheng and Gao Yang dominated the court in succession. They took whatever means, even disobeying the words of their father, and competed in establishing a new dynasty to strengthen their power.

Early in the planning stage of Gao Cheng's change of dynasty effort, his core staff member Chen Yuan-Kang (陳元康) said frankly that it couldn't be done, because "the time is not ripe." Gao Yang's pressing of his change of dynasty plan also created discouragement about succession, which was protested by his mother Lou Zhao-Jun (婁昭君) who said, "never consider seizing the throne," but accepted by nobles and courtiers, which made Gao Yang listen to public opinion and suspend his plan of seizing the throne. Nevertheless he eventually did push the change of dynasty; he finalized the plan quickly within 7 days to avoid the swirling objections. The reason why people tried to stop Gao Yang from seizing the throne was not because Gao Yang would not be a good king, but because they did not believe it was time for the Eastern Wei regime to fall. As a result, people were still obsessed by the Wei Dynasty even though Gao Yang's succession to the throne went smoothly, which in turn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early political tendency of Northern Qi Dynasty.

**Keywords:** Wei, Jin and Southern & Northern Dynasties, Gao Huan (高歡), Gao Cheng (高澄), Gao Yang (高洋), reminiscence in the Wei Dynasty.

---

\* Ph. D. stud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